

农业人类学发展五十年

马 威, 杜智佳

(华中农业大学 文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 从后殖民时代的农业、农业技术推广评估和可持续农业三个发展阶段, 综述了农业人类学发展的 50 年历程, 总结了农业人类学在各个不同阶段的研究主题。当今的农业人类学通过对小农生计可持续性的研究, 发掘地方性经验, 为各国生态保护贡献了许多智慧。研究的目的是希望农业人类学能够帮助中国推动农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以遏制资源破坏, 改善环境, 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 农业人类学; 后殖民时代; 农业推广;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456(2010)04-0068-06

1932 年, 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珊瑚岛园林和他们的巫术》(*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出版, 在书中, 他细致地描绘了处于南太平洋海域的特洛布里恩德岛民园艺种植的场景, 以及相伴而生的巫术与信仰体系^[1]。这种对无文字社会农业体系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应该算是农业人类学的萌芽。然而, 功能主义理论范式使得当时的人类学或民族志著作还都将农业作为社区功能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农业为主要对象的研究取向仍未形成, 对于农村社会(rural society)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亲属制度、居住模式、信仰体系等。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 以农业为主体的人类学研究走上历史舞台, 与此同时, 整体人类学研究领域拓宽, 以工业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著作越来越多, 参照式地使得农业人类学具备建立分支学科的条件。后殖民时代的政治经济问题、农业技术推广以及环境可持续发展等现实问题也推动农业人类学的发展, 使其成为应用人类学的重要分支领域。

如果从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人类学会正式将农业人类学设立为人类学分支学科算起, 农业人类学发展已有将近 50 年时间。笔者将它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即第一阶段(1960—1970), 后殖民时代背景下第三世界农业研究; 第二阶段(1970—1990), 农业技术推广评估与研究; 第三阶段(1990—至今), 可持续农业和生态保护。在这 50 年的发展历程中, 农业人类学伴随着对以上三个内容的研究, 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系统, 成为一门跨越科技与人文、面向人

类未来、具有强烈应用取向的学科。

本文通过对 50 年来农业人类学发展的剖析, 展现该学科的研究主旨、内容以及价值关怀。当今, 农业领域涉及转基因农产品种植、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新的课题, 需要农业人类学更多拓展研究领域, 为面对人类的农业发展做出贡献。

一、后殖民体系中的农业与农民问题(1960—1970)

众所周知, 西方人类学是伴随着西方世界殖民领地拓张而发展起来的学科, 相对于西方工业化文明, 进入部落社会的人类学家或多或少地关注了农业(园艺)文明的特点, 如家户性、嵌入性等, 其中, 亲属关系、信仰体系、交换网络等元素与农业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 农业对于这些工业文明之外的文化类型来说并没有形成产业, 不具备市场化、商品化的特点。

20 世纪 60 年代, 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劳动分工使得二战之前的殖民地国家纷纷进入全球化轨道, 处于前工业文明阶段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初级产品、包括农产品的供应国, 曾经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仍然没有摆脱再次接受经济殖民的境遇, 对于这些国家来说, “被控制”的农业其意义超越了家户经济, 成为了全球化经济体系中的被操控对象, 影响着当地人的生计方式, 乃至生活方式。

格尔茨在印度尼西亚调查中发现, 殖民和后殖民时代的政策鼓励着当地经济向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发展,在这种经济压迫下,农民被迫缴纳税款,以支持大农场产品的出口,这一规则与独立后的精英政策一起,使农村形成两极分化,大部分农民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他们没有能力积累资金,只能维持自身生存,农业产量长期没有发展,陷入到没有发展希望的“内卷化”僵局^[2]。与此同时,爱泼斯坦(S. Epstein)、贝利(Bailey)等人类学家也在受后殖民影响深重的南亚地区开展研究,产生了诸如《社会等级与经济前沿》(Bailey, 1958)、《印度南部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S. Epstein, 1962)、《南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S. Epstein, 1973)等著作,探讨了在后殖民时期,新技术的引进与经济作物重要性增强对当地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3]。马克思主义的冲突理论与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理论,以及依附理论为此期人类学的农业研究提供理论武器。如爱泼斯坦通过对于印度农业现代化的研究,提出了新技术、商品作物与雇佣劳动力加剧了农村两极分化的观点,解构了“发展”这一西方世界给予他们的幻象。他发现,随着灌溉技术的改进和经济作物的推广,农业成为商品化产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民依赖种植某一种经济作物获得利润,农业的家户性特点被破坏了,而农业产业的脆弱性又使这些农民暴露在市场经济的风险之中^[3]。

随着农业产业化,农民角色也发生着变化,“农民”成为了与“工人”相对应的职业化身份。格尔茨描述印尼农民在货币化压力下,不断通过压榨自身来获取微不足道的利润,而爱泼斯坦则关注了农业分化所导致的村庄共同体的终结,村中出现了穷人和富人阶层,人与人之间从传统的亲属网络变成了雇主和劳工的关系,以往能够给穷人提供某种程度保护的地主由于成为“产业主”而进入城市,农村成为穷人被迫坚守的地方。

在后殖民时代,全球化分工所造成的农业产业化,以及第三世界社会结构在产业化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阶级分层成为了此期研究主题,农业人类学以反思的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在随后的两个时期,农业人类学仍然发挥着反思者的角色,对“发展”“市场经济”“技术至上”等一系列来自工业文明的话语进行质疑和批评。

二、科学中的人文主义:农业技术推广的评估与研究(1970—1990)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类学的应用取向更

为明显,人类学家不再仅仅充当批评者,而且还是应用领域积极的实践者。在这一时期,农业人类学发展日臻成熟,学科领域确立,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不仅如此,农业人类学还为整个的人类学应用提供了有价值的方法论体系。

20世纪70年代,为了减少饥饿人口,提高粮食产量,国际社会开始向第三世界推广高产水稻种植技术,时称“绿色革命”。绿色革命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包括了国际组织、政府组织和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希望通过“绿色革命”来产生“滴漏效应”,从而减少贫困,改变人类生活。“绿色革命”的效果首先在墨西哥等地区开始出现,新的作物品种提高了粮食单产,区域性的饥饿现象得到控制^[3]。随后,巴基斯坦、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开始纷纷效仿,引入新品种。但是,在这些地区,技术推广并没有带来预期效果,粮食产量虽然提高,但是贫困问题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区变得更加严重。作为推动“绿色革命”的主要国际机构国际农业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CGIAR)聘请人类学家为其进行评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人类学家主动进入绿色革命目标区域进行其研究^[4]。

人类学家通过调查发现,新品种水稻的种植依赖于更多的水、化肥和农药,在灌溉条件和经济条件都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水稻才能发挥它的优势,而在山区,灌溉条件无法满足,或者贫困地区,人们无力承担化肥和农药支出的前提下,新品种甚至比不上传统品种的产量。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弗兰克研究了印度尼西亚爪哇中部的绿色革命状况,他发现,他所研究的村子获得了70%的粮食增产,但是村里只有20%的农户参与了发展项目,他们都是能够为新品种支付成本的富裕农户,而村里其他贫困农户为了维持生活,到富裕农户田里打工。最后,为了控制这些廉价劳动力,富裕农户垄断了新品种的种子供应,限制贫困农户参与发展项目,而贫困农户为了保障在遇到困难时能够获得富裕农户的借款,也不敢参与项目。弗兰克的结论是,科技问题远远不单纯是科技问题,我们无法期待用科技来解决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矛盾,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所要回避的问题,正是大多数人无法回避的问题^[5]。

另外一些人类学家对项目本身提出了批判,认为绿色革命给第三世界带来的结果甚至是灾难性的。有学者认为,新品种的水稻设计满足于农业综合企业化要求,大量的投入带来大量的产出,但是在

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第三世界国家则不适用,推广的结果只能导致一部分土地集约,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有可能陷入破产的境地^[5]。

这些人类学家都是运用民族志方法,结合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从农户的角度来反思项目推广中的问题,为“自上而下”式的项目推广提出警醒。

学者们试图从方法论角度来解决以往问题的症结。钱伯斯(R. Chambers)认为以往存在于发展项目中的诸多问题都是源于项目设计者的偏见,他们不了解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实际状况,对地方性知识缺乏敏感度。避免这一问题发生的唯一方法就是要“把农民放在首位”,更为重要的是,让农民自己参与到项目设计与评估中^[3]。他撰写了《农村发展:将穷人放在首位》一书,提出了“草根”发展的思路,改变“自上而下”式的发展模式,提出项目中的农民不是发展对象,而是合作伙伴,项目在设计 and 实施过程中,都应该听取农民的意见^[6]。对于农业人类学者而言,“把农民放在首位”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要运用人类学的经验和理论,把握农民的知识体系,了解农民的思维逻辑,只有在认识的前提下,才能够谈得上尊重。下面的案例就生动地展示了农业人类学家在项目中的工作,以及他们帮助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路径。

1974年,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国家马铃薯中心(IPC)成立,设立在秘鲁首都利马的研究中心其目的是为了收集和储备世界性马铃薯胚胎原品种,成为马铃薯种的世界银行。与此同时,中心负有推动当地马铃薯种植,提高马铃薯市场价值,改善当地人经济条件的职责。在中心中,人类学家的任务就是配合和帮助技术人员推广围绕马铃薯而开展的各种技术。在中心设立之初,技术人员就为秘鲁政府设计了五个巨型马铃薯储存系统,仓库设置在马铃薯产地和利马市场中途,方便农民销售。但是,这些设备却并没有被农民所使用,闲置的设备造成了浪费,人类学家洛蒂斯(Rhoades)、巫格尔(Werge)被委托调查其中的原因。人类学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发现,集中贮存违反了当地农民的习惯。当地人将马铃薯存在家中,目的是获得人与物同在的安全感,他们并不在乎运输中间的损失,同时,在家中干掉马铃薯也被主妇们认为是可口的美味。对于当地人来说,如何防止马铃薯长芽才是技术人员应该帮助解决的事情。经过IPC技术人员的探索,利用弱光抑制的原则,可以把房屋外的走廊作为储存地点,一方

面解决了马铃薯长芽的问题,同时也符合当地人愿意把马铃薯贮存在家中的习惯。这种贮存方法成本低廉、提高种薯质量,同时节约了农民的种植时间,方案一时间被广泛采纳^[5]。

这一事件给予项目管理者以很大的启示,技术推广的路径不能完全依赖专业技术人员,农民是技术的终端使用者,对于技术的接受与推广应该充分考虑他们的意见。农业人类学者洛蒂斯和巫格尔在随后的总结性文章中提炼出了一个概念,称为“回归农民模式”(farmer-back-to-farmer model),这是一种来自农民又回到农民身上的工作模式,它能使改良的农业技术最终为农民所接受,不至于脱离农民的实际情况^[5]。

在对“绿色革命”反思中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方法被体系化地建立,并得以广泛应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ion Rural Appraisal, PRA)、农事系统研究(FSR)、农村快速评估(RRA)等被广为应用,其基本思想是运用参与方法将农民等被发展对象变成发展主体,改变发展者获取、认识与利用地方知识及信息的方式。而其中的农事系统研究是通过研究者参与地方农业系统中,收集包括亲属制度、社区治理等在内的与农业有关的各方面地方性知识。由于其彻底的草根性受到许多组织的青睐,应用于扶贫、妇女发展、社区建设、政策制定等各个层面。根据诺曼的统计,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概有250个跨国的中长期项目中都使用了FSR方法,而从1978到1988年10年间,仅国际发展美国事务署这一个组织就在其资助的76个各种农业发展项目中使用了该方法^[7]。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由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各国政府农业部门主持推广的发展项目遍布世界各地,跨文化所带来的问题也愈显突出,技术专业发现必须依赖对当地的社会文化了解才能够实现“技术造福人类”的愿景。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例,“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类学者由于数量巨大,专业研究领域无法容纳,恰好为人类学应用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4]。

于是,这一时期的农业人类学进入到黄金时期,农业人类学学科也作为正式的人类学分支之一得到学界认可。标志性的事件当属1976年,美国人类学会召开了第一届未来文化和人类学学科发展非正式会议,在会上,农业人类学被正式作为人类学分支学科进入讨论议程。如今,文化与农业协会(culture

and agricultural C&A)作为美国人类学学会下设分支之一正式在农业的文化研究领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随后,更多的人类学家以推广者、评估者,甚至是管理者的身份进入到各个发展机构。虽然他们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技术“在地化”评估,但是他们合作伙伴主要是技术工作者,同时农业技术含量增加使得农业人类学者们必须掌握更多的技术知识才能够胜任其工作。所以,农业人类学者们的知识结构具有了很强的跨学科性质。农业人类学专家洛蒂斯(R. Rhoades)对农业人类学的定义中突出了其沟通技术与人文的特点,“农业人类学是运用人类学的比较方法和整体观视角研究农业活动中的人类因素,关注在地方和全球的食品系统中,环境、技术和文化的互动,同时在实践目标的指导下,运用人类学知识推动食品和植物产品生产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4]。可以说,农业人类学者们关注整个农业系统的人类因素,从生产到准备、分配、消费和储存,并研究在其中人们所采用的文化手段和文化实践。在农业技术推广中,人类学家的贡献主要在于帮助项目管理者 and 科技工作者发现当地农民的知识系统,让专家向农民中学习“地方性知识”,提供发展中所缺少的“自下而上”的视角。

三、可持续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1990—至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个共同的话题摆在了全体人类面前,人类的发展造成了自然环境的恶化,保护生态环境迫在眉睫。1992年,全球首脑会议在里奥举行,会议呼吁应用人类学尽快为改善人与环境的关系做出贡献。农业人类学作为长期研究人与自然互动的学科而受到关注,其所提出的“可持续性”(sustainable)发展概念在新时期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4]。

“可持续性”概念是农业人类学者在对小农生计(smallholder livelihood)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前文提到,20世纪80年代,在对农业技术推广与农业革命的反思过程中,农业人类学家发展了许多基于人类学理念的方法系统,而最为彻底地草根化,为“自下而上”模式提供扎实视角的是农业系统调查(Farmer-System-Research,FSR)的应用,研究者深入农业劳作现场,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掌握农民的作业规律、生计安排和经济规划,了解农民理

性,以农民为中心,凸现农民在农业制度设计中的主体性。通过这一方法,学者们有了另一层次的发现,农民能够理性地了解其所处的环境及所拥有的资源,能够合理地运用和配置资源,能够根据资源状况调配作物种植和实施田间管理。小农往往通过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本来实现资源的节约利用,达到可持续性的发展目的。

莱廷(R. Netting)教授在其著作《小农:农业家庭和可持续农业》(*Smallholders, Householders: Farm Families and the Ecology of Intensiv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中通过呈现和分析来自非洲、亚洲、欧洲和美洲等各地的民族志案例,证明了存在于小农文化中的一些普遍的,根深蒂固的共性,这些共性完全不同于今天主流价值观所倡导的集约化、工业化农业,后者的发展依赖于机械化作业,并使用化学杀虫剂、化肥和除草剂等化学物质,占有大量土地,造成水土资源的大量破坏和浪费。而前者则能够运用畜耕、粪肥以及手工作业等低能耗、低投入的方式,拥有了更好的适应性,实现节约能源的“可持续性”生产。莱廷用事实论证,在同一区域,生产能力上小农并不逊于集约化农业,更重要的是,小农在会有效地节约能源,减少对自然的破坏^[8]。

基于小农生计模式研究,学界提出了“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L)概念。诺曼(D. Norman)为可持续生计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这是一种不同于工作(job)的思维和生产模式,其中包含了复杂的生产行为、资产管理、社会关系,是一种基于资源利用基础上的生计维系,在可持续生计视角下,农民的逻辑、方式和权利得到应有的重视^[9]。同时“可持续生计”中包含的理念是对“发展”观念的彻底颠覆,通过对小农理性的发现,人们意识到以往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价值取向实质上造成了资源浪费,是不可持续性发展。而可持续性模式中所包含的,不仅指生产模式、还有生活方式、管理体制和配置方式等,目标不是经济发展,而是根据多元化原则,达成人与自然的紧密互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国际开发署不断设立了一些旨在研究可持续农业的环境保护项目,例如1997年,设立“可持续农业和自然资源管理合作支持项目”(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Collaborative Research Support Program,SANREM CRSP),推动农业可持续

的跨国研究,并且运用应用模式,推动区域的资源管理和利用。参与者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开展工作,探讨地方性知识在资源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农业人类学家洛蒂斯在该项目中开展了关于水资源利用的研究,研究地点在厄瓜多尔的纳奈加尔地区,经过几年的追踪发现,当地人不是去“管理”水资源,他们只是通过观察地表水文来适当地调整对水的利用情况。William G. Deutsch 等人的研究运用了“参与法”提升当地居民的管理意愿和能力^[10]。而 Michael K. Bertelsen 等人则在西非干旱、半干旱地区的马里开展了培育基于社区的分权决策体系,建立农民经验与管理者经验结合的资源管理模式,以缓解资源矛盾^[11]。

部分地区积极建立了资源节约模式,操作的核心在于以社区为单位,当地人为主体,对社区资源进行评估,依循地方性知识,实现资源管护。以土地为例,澳大利亚、新西兰各地由民众自发成立的土地关爱小组(Landcare Group),政府在 1992 年开始发起了国家土地关爱项目(National Landcare Programme, NLP)。

进入 21 世纪,“可持续性”的概念已经超越其在“农业模式”中的涵义,不仅仅指人们在食物生产中能够循环地利用自然资源,预期资源在几年之内的可持续使用,而且包括了人们在与自然互动和资源利用方面的观念和方式的根本转变,使人类的活动方式能够彻底与自然达成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利用和攫取,人应该成为系统的一个部分,成为自然循环的有机组成。国际组织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动的发展项目也改变了单纯以发展经济为目标的传统取向,更多地转向了资源管理、环境保护等主题,与此前的时期一样,农业人类学家的工作是将人类学方法导入其中,关注地方性知识的运用和当地人主体性的建立,他们提倡资源密集型的小农业生产模式,普及有机肥和精耕等生产方式,认为这种复合型、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能够整合资源和劳动力,耗能少、能效高,能够达成环境友好互动。

近年来,国际粮农组织(FAO)、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IIED)等组织和大学、民间机构等都设立了支持“可持续农业领域”的项目,希望能够通过推动农业领域的可持续发展来遏制资源破坏,改善环境。这些研究都意识到了人在环境保护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在研究环境保护,不如说他们通过对人,或对社区的唤醒和制度建设来促使人际

与自然的融洽共生。

四、结 论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以反思和批判姿态进入人类学领域的学者们发现了第三世界国家所遭受的后殖民剥削,而剥夺的主要领域体现在农业,于是,作为经济类型的农业从农村研究中独立出来,形成专门的研究领域,与农业有关的政治问题、平等问题也被深入探讨。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人类学与农业领域的技术推广相结合,为农业推广进行评估,并为有效的推广探索各种路径,人类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这一领域的施展扭转了农业技术推广的既有模式,甚至影响了世界范围政府和组织在进行政策和项目实施的方法。最近 20 年,农业人类学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人类可持续发展,积极寻找和探求能够节约能源、保护生态,实现人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地方性经验,当然作为具有强烈应用取向的农业人类学也为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进行着积极的服务。

我国的农业人类学研究严格说来虽然处于空白,但是具有农业人类学性质的研究早已起步。如杨庭硕从 80 年代开始追踪调查生活在贵州山区的麻山支系苗族,如何运用农业传统知识来进行水土保持,认为发掘和利用苗族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能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取得无法替代的成效^[12]。孙秋等^[13]提出了在生态建设过程中要结合民族文化模式特点,进行文化模式的嫁接,利用原有的观念促动当地人主动接受技术推进。而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在农业推广领域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如李小云等^[14]也运用参与评估等手段来发现农业推广在中国场域的本土化问题,不仅采用了人类学方法而且研究本身具有了人类学的学科属性。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使用方法并不代表农业人类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我们应该立足中国特色,运用学科智慧研究中国经验,开创本土化学术体系,使中国农业经验推动国际农业人类学研究的进步。

如今,农业生态系统研究越来越成为农业人类学的焦点,农业生态系统具有人文和自然的双重属性,保护生态环境既是一项科学事业,同时也是人文事业,农业人类学者能够为政策执行者提供来自生态科技运行中人的信息,发掘人与自然的互动地方性经验,让我们意识到,任何基于因果关系的机械式社会变迁模式必然会排斥与压制人们生活的丰富多

样性,从“他者”的角度才能够为人类社会达成自身和谐,以及与自然的和谐寻找新的空间。

参 考 文 献

- [1] BRONISLAW M.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the description of gardening[M]. New York:Routledge,2002.
- [2] GEERTZ C.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e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donesia[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 [3] [美]凯蒂·加德纳,大卫·刘易斯. 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M]. 张有春,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1-52,58,74.
- [4] RHOADES R E. Agricultural anthropology——applied anthropology; domains of application[C].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5: 63, 72, 74, 80.
- [5] 石奕龙. 应用人类学[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242,243,243-244,246-250,251.
- [6] CHAMBERS R. Rural development; putting the last first[M]. Harlow: Longman, 1983.
- [7] NORMAN D W. The farming systems approach: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the collection of the 17 symposium of the international farming systems association [C]. Florida: Lake Buena Vista, 2002.
- [8] NETTING R M. Smallholders, householders: farm families and the ecology of intensive[M].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8-29.
- [9] NORMAN D W. Farming systems research to improve the livelihood of small farmers[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8, 60(5): 813-814.
- [10] WILLIAM G D, JIM L O. Formation,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of a citizen volunteer water quality monitoring group in Mindanao, Philippines [C]. SANREM CRSP Publishment, 2000: 13-20.
- [11] BERTELSEN M K. Holistic management in west Africa: a new approach to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decision making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decentralized commune level[C]. SANREM CRSP Publishment, 2000: 29-38.
- [12] 杨庭硕. 苗族生态知识在石漠化灾变救治中价值[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07(3): 24-33.
- [13] 孙秋, 周丕东. 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社区自然资源管理的实践与认识[J]. 贵州民族研究, 2002(4): 137-141.
- [14] 卢敏, 李小云. 论农事生产系统研究范式[J]. 农业技术经济, 2001(4): 54-58.

Review of Agricultural Anthropology for 50 Years

MA Wei, DU Zhi-jia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From three stag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the past 50 year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themes of Agricultural Anthropology in different stages. Through the study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rmer's livelihood, the current Agricultural Anthropology explores the local experiences and contributes so much wisdom to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in the world. This paper aims that Agricultural Anthropology will be able to help China push forwar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al field, restrain the resources waste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so as to harmoniously coexist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 words agricultural anthropology; post-colonial times; technique extension of agricult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侯之学)